

座談－婚姻平權與酷兒解放的未來

時間：2016年6月4日（六）下午2-5點

地點：客家藝文活動中心會議室（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157巷19號3樓）

主持：黃道明（中央大學英文系）

主講：Kenyon Farrow 范鏗吟，前酷兒經濟正義組織執行長、現任愛滋治療行動組織美國與全球健康部門主任）

回應人：高旭寬（台灣 TG 蝶園發言人）

翻譯：黃道明、丁乃非、葉德宣，何春蕤（中央大學英文系）

黃道明（主持）：歡迎大家參加中央性／別研究室今年第五輪系列演講，我們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 Kenyon Farrow 來台灣。Kenyon 是一位備受推崇的美國社運分子和作家，過去 15 年，他組織過大大小小的社運連線，層級的規模從地方、全國、到全球，在社運的經驗與經歷上都非常豐富。2012 年開始，美國發生多起警方執法時濫權殺害黑人的案例，黑人在種族壓迫下連日常生活也在行政司法下被選擇性地暴力對待，因此引發了黑人社群的串連抗爭，形成晚近席卷美國的 Black Lives Matter「黑命關天」運動，Kenyon 就是這個全國運動的領袖之一。

本週二他在中央大學已經以〈黑命關天運動的歷史源流〉為題目，從他個人家族成員 1960、70 年代參與美國黑豹黨發起的黑人社群自衛、自我教育、自我照顧的社區動員講起，又追溯了 15 到 19 世紀的跨大西洋黑奴販賣如何構成了現代性的重要歷史成份，以及這段歷史如何延續到美國後種族時代監獄複合體（the prison industrial complex）的興起，最終提醒在場聽眾要注意美國國家資本社會正在大規模的採用犯罪化監禁的手段來處理種族矛盾與階級矛盾。那場演講非常精彩。

Kenyon 過去曾經擔任紐約「酷兒經濟正義組織」（Queers for Economic Justice）的執行長。前幾年曾來訪的性激進派女性主義者荷安珀 Amber Hollibaugh 也曾是這個組織的執行長，可惜這個組織現在因為募不到經費而經營不下去了。這也跟今天要講的同婚有關係，因為同婚的議題吸走了所有的捐款，以至於處理酷兒經濟正義的組織無法再生存。

Kenyon 過去致力組織對抗過很多議題。比如說，紐約市在都市空間仕紳化過程中將有色人種青少年入罪化，2008 年 Kenyon 就曾經發起「掙脫枷鎖計畫」Project Unshackle，那次是他首度串聯愛滋運動者與監獄改革行動者，推動愛滋的除罪化，也爭取未成年人在尋求 HIV 治療照護的期間能保有隱私權與居住權。在任職「酷兒經濟正義組織」任職的那段期間，Kenyon 也努力串聯美國 LGBT 的草根組織，強化這些組織介入經濟和種族正義議題的能力，並在一片白人中產主導的同婚運動之中，以酷兒經濟組織署名，起草發出一篇叫做〈超越婚姻〉的重要聲明，表達了左翼的酷兒觀點。

Kenyon 現在是「愛滋治療行動組織」美國與全球健康政策部門主任。我要說一下這個組織。大家可能聽過，美國愛滋運動有一個叫 ACT UP 的組織，它 1992

年之後分出新的組織，有一部份人專注倡議治療研究和愛滋，像是一個獨立的智庫團體。Kenyon 的工作當然聚焦於愛滋的防治，但他在這份工作裡很努力地把愛滋防治跟改變社會結構結合在一起。也就是說，現在愛滋運動往往是單一議題走向，而 Kenyon 希望做一個橋樑，把治療防治的問題跟改變社會結構的社會運動結合在一起。蠻重要的是，他也在他的工作中納入了肺結核防治。因為肺結核往往是跟貧窮交結在一起的，現下公衛處理肺結核的方式很違反人權，很不可思議的粗暴對待，而 Kenyon 就關注到這個議題。所以你看到，他的視野是非常有階級與種族眼界的。

Kenyon 同時也是一個非常會寫文章的作者，他是《青年行動者快報》的主編之一，他的文章散見於各種文集和報章雜誌網路中，對婚姻平權、愛滋議題、美國種族主義、美國軍國主義、和美國同運的發展都提出非常犀利的見解。如果各位看過〈苦勞網〉上面我們先發的那三篇他分析流行文化再現政治的文章，就會看到他很深入流行文化裡的再現，非常脈絡化、具體地去看這些壓迫。他的分析功力非常厲害，也因為這樣，很受到美國學院的重視，所以他曾經去過很多美國著名大學做會議的主題演講。

今天 Kenyon 的演講主題是「超越平等、婚姻平權、與酷兒的解放未來」，他會深入反省婚姻平權主張的侷限，並從處理多重交織壓迫的酷兒左翼解放路線，放眼未來。我們今天同樣也很榮幸，請到 TG 蝶園的高旭寬作為 Kenyon 的回應人。旭寬的發言大家應該都不陌生，思考清晰、尖銳又非常給力，每次聽都會覺得很爽，所以很期待他以跨性別的角度來回應同婚的議題。最後我再介紹幫忙翻譯的老師，左邊是葉德宣老師，下半場則由何春蕸老師接棒。另一邊是把中文發言翻譯成英文的丁乃非老師。現在時間交給 Kenyon。

Kenyon (葉德宣翻譯)：感謝大家願意在盛夏中從四面八方趕到現場來聽演講。今天我希望談談美國同志平權運動在過去 10 年裡的演變，特別是現在在美國的發展，以及這些發展對全球 LGBT 運動和工作有何蘊涵。

今天很多人說到美國的 LGBT 運動時都是用 1969 年紐約市石牆暴動事件作為起點，事實上，當時同時還有其他類似事件在紐約之外的各地發生，也可以再追溯到更早歷史的一些事件。但是今日理解美國當代 LGBT 政治還是主要基於對石牆運動的認識，認為運動的主要訴求是同性戀的去刑事化。

可是 1960、70 年代，大部分在 LGBT 運動裡的人都和其他各種激進運動有關連，包括反核武擴散運動、反軍備運動、黑人解放運動、老墨解放運動以及其他解放運動，當然也包括女性主義運動。而且石牆暴動是因為紐約市警方以暴力對待同志而引發，而紐約市警察和聯邦調查局都認為石牆的暴動有黑人黑豹黨和地下左翼組織的幫助。我指出這一點，是要說明 LGBT 運動的根本基礎是激進的，而也被美國政府視為和其他激進運動和組織有關連。

問題來了。我們要怎麼理解這個很弔詭的轉變？本來這些 LGBT 組織和團體是被美國政府當成和激進左翼或解放左翼相關聯的，那麼早期的 LGBT 團體是怎麼發展到後來，變成一種只要平權的、或是很保守、想要跟當權或是中間派接合的政治？怎麼會從那邊走到這邊？

比較簡單的一個答案是愛滋病。1980 年代初期，愛滋作為一個傳染病進入美國大眾的認知，這個病造成許多男同志死亡，當然也衝擊到那些富裕而有資源的白人男同志。這些人在愛滋發生之前與同志運動毫無關連，但是愛滋危機出現後，他們變得很活躍，開始把金錢和資源投入這個直接衝擊到他們的議題。除了愛滋以外，他們也投了很多資源到其他和他們價值觀相合的政治議程上，有些即將死於愛滋的男同志甚至把全部財產留給運動組織，在 1980 年代的美國支持了不少主流組織成立。1992 年，科林頓首度競選總統時，正好遇上這個初初成形的同志選民群，科林頓為了討好這些選民，應允當選後會為同志社群推動一個政治議程，改變原本禁止男女同志從軍的聯邦政策。

事實上，1992 年可以說是同志平權運動的啟航，運動越來越環繞著主流議題來進行組織。例如大家已經熟知的平等從軍權、平等婚權，第三個就是反仇恨罪行立法，這種聯邦層次的立法在理論上保護那些因著種族、性別、性傾向、宗教、族群身分而被歧視的人。第四個就是改變法律，讓在住屋、就業、和其他公共資源上因著性傾向而歧視他人，成為違法。目前在美國，主流同性戀運動的平權議程幾乎已經大功告成了：歐巴馬政權終止了對同性戀禁止從軍的禁令，聯邦法律已然通過把性傾向和性別認同包含在反仇恨立法中，另外，2015 年美國最高法院也已經容許同性婚姻在美國成立。

接下來我想談的是在這些訴求圓滿解決之後發生的事情。美國有了哪些改變？有哪些改變正在發生而且這些事情也在其他國家發生？在平權運動努力的 4 個議題裡唯一被放在一邊的就是反就業歧視法，這個立法將可以保護 LGBT 人權不會因為其性傾向而被去職，也保護他們在居住上不受歧視，以及阻擋其他的歧視。不過由於反歧視法案尚未通過，我們現在看到的動作多半是基督教右派組織的行動，他們在一些州裡設置宗教自由豁免法，比方說，如果我經營一個店，一對同志伴侶進來想要訂結婚蛋糕，那我就可以合法的以我的宗教立場，拒絕為他們提供服務。

美國 LGBT 運動在倡議婚姻平權這個議題時也犯了一些類似錯誤。有一個主要的例子就是，要是你仔細看看這些新設立的宗教自由豁免法案，你會發現它們的目標很寬廣：對於一個人可以怎樣呈現自己，描述自己，定位自己，對於我可以在何種基礎上拒絕提供服務，這些法案所涵蓋的都不止於性傾向和性別認同而已。這也就是說，宗教自由豁免法對於全國其他各種人口群體都有寬廣而深遠的影響。但是 LGBT 運動並沒有積極的串連迎戰影響其他人口的議題，而只是在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的概念上抵抗這些法案。

結果，最有效反對這些法律成立的力量主要來自哪裡呢？不是同志運動，而是大企業。由於立法是在州的法律層次上運作，為了阻止宗教豁免法案成立，大企業就威脅要將他們的資金從這些州裡面撤出。例如，北卡羅來納州要討論設置這些宗教自由豁免法，全國美式足球聯盟出於自己的利益考量就出來抗議。他們抗議的方式則是：原本美國人熱愛的超級盃 2017 年要在北卡的夏洛特舉行，會為北卡帶去數萬球迷和極高的消費，足聯的杯葛方式就是威脅要把超級盃活動從北卡撤出。最終，州政府只好否決了宗教自由豁免法。

這麼一來，我們要為這些跨國企業在 LGBT 議題上站了立場而感到鼓舞和歡慶嗎？我們不能質疑這些跨國大企業在美國環境惡化上所扮演的角色，我們不能質

疑他們在美國和其他國家裡的雇用措施，但是我們要為他們同志友善到願意出來挑戰州政府層次的宗教自由立法而歡欣鼓舞。這不是很諷刺的嗎？

下面我想談談美國的平權運動如何衝擊全球。最首要的發展之一就是，一旦那些以美國為本的 LGBT 基金會送出清楚訊號——同婚法案在未來幾年即將通過——就有很多金錢和資源集中到同志婚權議題上，以幫助世界其他國家的 LGBT 人群爭取同樣的法律權利。在非洲、中東、加勒比海、東歐、前蘇聯國家裡都出現了大量資金和資源投入同婚議題。

我有很多在南非搞社會運動的朋友就指出，這種資金的移動和集中影響很大。由於是美國金主或美國 NGO 主導，因此在地的工作往往被指導投入美國主流平權運動關切的議題。例如，奈及利亞本來有很多組織在推動改進女性生殖權利的法案，或者反腐的法案、反暴力的法案，他們正在討論如何引入 LGBT 的組織，思考如何改寫法案把不同人群的需求納入。但是美國金主卻說，這不是他們要的，他們要的是在奈及利亞政府裡面直接提出反 LGBT 歧視立法以及同志婚權立法，全然忽略了此時此刻在這些國家裡強勢展開反歧視的工作，不但在政治上很危險，也可能帶來身體安全上的威脅。

同時，除了來自美國看起來非常進步的 LGBT 勢力在其他國家推動支持 LGBT 的立法外，以美國為本的基督教右派組織也在這些國家推動反 LGBT 的立法。結果這兩種非常龐大的來自於美國的勢力就在異域產生角力，在某些地方，在地人口根本還沒找出最好的策略來推動比較激進、進步的目標，就已經被夾在美國政治光譜兩極之間。例如在非洲的奈及利亞、肯亞、烏干達，這些國家本身的宗教組成就非常複雜，比方說奈及利亞南方主要是歐洲族裔人口，信仰以基督教為主；北方的族群則主要是伊斯蘭信徒。奈及利亞當地的領導人就會利用美國右派的反 LGBT 立法行動，以及美國 LGBT 金主大量投入資金的事實，來聯合在地的不同宗教派系，以形成一種特殊的恐同氛圍，甚至使得黑種奈及利亞人願意支持他們腐敗的政府。

最後總結，我們觀察到的這些同志運動裡的變化，最根底的原因來自於全球化的資本被操作在全球建立同質性很高的城市，充斥著富裕的人口，他們可以隨意的移居到其他城市，毫無差別，也以一個現在非常保守的框架來理解 LGBT 平權，使它變成一種由 21 世紀大都會和自由民主來定義的模範，並要求各國接受這個模式，或者至少努力往這個目標前進。我認為這個發展很緊密的聯繫到我們目前觀察到的一切，例如土地的持有、城市的仕紳化、資本重組搭配全球大都市、文化上趨於同質，並且使得 LGBT 平權框架成為了這個新自由主義大計畫的一個部份。

黃道明：謝謝 Kenyon 和德宣的翻譯，接下來請高旭寬為我們做回應。

高旭寬（回應）：Kenyon 從美國黑人的角度來談同婚運動，我被期待從跨性別的角度來談婚姻平權，以下就叫做同婚。在台灣，同婚的意義幾乎已經等同於「尊重性少數」。去年我有一個家境優渥、含著金湯匙出生的跨性別朋友叫我一定要支持同志婚姻，他說他的教會朋友表達反對同婚的立場，讓他這輩子第一次覺得被嚴重歧視。反同婚就是反對 LGBT 的平等人權，不過我比較驚訝的是，他竟然到現在才感覺被歧視，可見性少數的命運真的是每個人都不一樣。

同婚運動席捲了大部分性別運動的能量與能見度，儼然成為對抗保守宗教勢力的基地。然而，世界各地都有運動組織開始反省國際串連的同婚運動所帶來的各種負面效應。**Kenyon** 就從黑人的角度談美國的同婚運動，那我今天就試著從跨性別的角度來談「為什麼我們不把同婚當成運動優先爭取的目標」。

其實「台灣 TG 蝶園」以前參與過多元成家修法的籌備會議，但開會幾次之後就決定退出。原因是覺得跨性別在伴侶關係上遇到的問題並不是「沒有結婚權」。對於結婚權無感，當然也就累積不了運動動能。那跨性別在伴侶關係上會遇到什麼問題呢？

2016 年 2 月上映了一部很轟動的電影「丹麥女孩」，主角是知名的繪畫大師埃恩納，跟妻子葛蕾塔結婚之後，有一次為了當模特兒穿上女裝，開啟了他壓抑多年的「當女人」的慾望。埃恩納越是女性化、越往女性角色發展，他跟葛蕾塔在情慾和伴侶形象上的期待就落差越大，關係也越來越緊張。好，我們回到觀眾的位置上，我發覺很多人看完電影之後投射最多情感的對象是主角的太太葛蕾塔。大家覺得她雖然很痛苦，但卻能夠用無比的真愛接納丈夫變性，實屬難得。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會想，我們之所以覺得葛蕾塔對丈夫的愛特別難能可貴，很可能是因為她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掙扎，就像母愛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媽媽像蠟燭一樣燃燒自己，無私的奉獻對吧！那麼我們歌頌真愛、渴望真愛的背後，又透露出我們準備用什麼態度來面對伴侶跨越性別所產生的各種矛盾衝突呢？

仔細觀察過去台灣媒體上爆發的跨性別事件，不難發現無論是閱聽大眾或相關人士，多半會指責跨性別者在伴侶關係中欺騙對方、不負責任、誤人一生，很像大陸現在在吵的同妻議題。台灣的法律並沒有強迫已婚的跨性別者在變性之後必須解除婚姻關係，但我們社群裡還是有很多人跟配偶走不下去，得協商離婚。去年台中一中的曾老師變性，受到全校師生的支持，並且在蔡依林的演唱會上掀起台灣性別友善的高潮，蔡依林前段時間大量使用婚姻平權當作表演題材，邀請曾老師出席的那場演唱會主題正好就是「不一樣又怎樣」，提倡尊重多元、接納差異，要求婚姻平權。但是，在其他的談話性節目裡，十分受到社會愛戴的曾老師卻表示他是在妻子生病過世之後才決定走變性這條路，如果妻子還在，他大概不會做變性的決定，怕衝突太大會影響關係。

我常想，婚姻平權的倡議對於跨性別者與配偶之間處理身體、慾望、裝扮、形象和關係上的各種卡關與不協調有什麼實質的助益嗎？（「卡關」的意思是卡在某個環節破不了關）

2015 年下半年，新聞前後報導了兩起英國跨性別的刑事案件。當事人女扮男裝，多次用假陽具跟女性做愛，後來被發現是女性身份時，對方就非常生氣提告性侵，其中一位還被判了數年徒刑，有新聞說 8 年、有新聞說 2 年，反正他就是被判了性侵的徒刑。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候英國大部分的地區都已經通過同性婚姻法案。北愛爾蘭雖然沒有同婚法案，但在法律上也有民事伴侶關係的保障，為什麼一個普遍接受 LGBT 平等人權的地區，還會因為性伴侶的性別超乎預期而大動肝火，而且法院也以性侵害之名將他定罪呢？

台灣的社會新聞中也不時會出現「男子約砲遇到偽娘 驚嚇落跑」的驚悚事件，2014 年的新聞就有。事實上，指責跨性別者欺騙或約砲驚嚇落跑的故事是我在跨性別社群中比較常聽見的真實狀況。對照另一邊婚姻平權的發展，我們從電視

上伊莎貝爾喜餅廣告裡看到兩個老男同志互相整理衣領、親吻的畫面，感受他們相伴 30 年真摯的情感，也從許多倡議同婚的故事裡聽到相伴二三十年卻得不到法律保障的遺憾。

近年來尊重 LGBT 人權、接納差異的溫情宣導和政治正確的氣氛，讓丹麥女孩埃恩納少了很多自私欺騙的責難，但是，當我們為葛蕾塔的真情感動萬分時，有沒有警覺到跨性別的生命經驗在二元性別社會裡所產生的尖銳衝突並沒有真正被大眾面對？沈重的壓力反而悄悄地隨著同婚運動的浪潮，再度擠壓到伴侶之間，讓雙方用「真愛」來承受。

砲友之間不講真愛，因此強烈的情緒衝擊有空間可以爆發，跨性別真正面對的挑戰是「憤怒提告性侵」和「遇到偽娘驚嚇落跑」那種內在扭結的情感結構。要想辦法在關係中變化彼此的對待方式，婚姻權反而不重要（有哪個太太不覺得自己老公扮女妝很噁心呢！）。再說了，「真愛」真的無敵嗎？如果大家都看懂異性戀愛情廣告的虛幻，為何對同志愛情卻這麼全心擁抱？

結婚一向不是兩個人的事，而是兩家子的事，需要面對更多期待，需要和更多人斡旋，「可不可以穿女裝出現在丈母娘面前？」「我扮演不了一個好媳婦的角色怎辦？」，對跨性別而言，婚姻是困難重重，處處卡關的課題。這就是為什麼我反對同志運動優先爭取婚姻權，也反對過度美化同婚。性別運動不能只看性別。

第二部分，我想談對於目前同志運動的想法。現在 LGBT 團體只針對性別、性傾向的相關事情發聲，先把複雜的事件定性成「性別問題」，接著就想用「性別立法」來解決原本那個複雜的問題，看起來主體好像被保障了，但實際上卻讓更邊緣的人有苦難言。（以下我描述的故事都經過當事人同意）

並不是所有跨性人用「性別友善或性別平等」就可以安放人生。這麼多年來，我一直想把馬偕違法解雇案說清楚，現在終於有機會。馬偕案當事人周員有一次跟曾老師一起上談話性節目，他拼命想告訴大眾，並非人人都像曾老師那樣幸運，但是他怎麼講都只能繞在性別歧視這件事上談一種經驗差異，好像有人很幸運被接納，有人卻不幸身處在充滿壞人（歧視加害者）的地方。

我算是對周員有深一層的了解，他的困難處境不只有性別，更艱難的是他的階級。經濟狀況不佳，40 歲前，馬偕是第一份穩定的工作，周員人緣欠佳（表達和溝通都不夠成熟圓滑），工作上較常犯錯，原本有好同事可以涵容他的弱點，但他這個同事因為能力好被調去寫程式，馬偕擴充設備卻不願意多雇用人，只是加重原有職員的工作量。周員就在資方「人力短缺」和「人事調度」下失去工作上和人際上勉強維持的平衡，跟同事關係越來越僵。後來跟上司提資遣，馬偕卻不想給資遣費，周員只好自力救濟以怠工來平衡工作壓力，當然也就更引起主管和同事的憤怒。

對周員來說，他當時極度需要社會輿論的支持，這些複雜的真相在馬偕案爆發之後都是必須極力撇清的，否則在資本主義競爭逐利的邏輯下，根本不會被同情和理解。當時候網路上充滿批評的聲音說：「工作有好表現怎會被免職？一定是個人有問題！」

周員的性別身份(MTF)看起來雖然是弱勢，但是在政治正確的性別友善氛圍裡，卻反而成為扳回一城的利器。他在被免職的前四個月開始穿女裝，希望主管受不

了把他資遣（結果馬偕還是不願意付資遣費），周員搜集了完整被主管訓斥和糾正的證據，就這樣打贏了所有的官司，也獲得賠償，這是 2011 年的事，一直到 2015 年，條件好、沒有道德瑕疵的曾老師成為媒體寵兒，周員跟曾老師並列在一起的時候，他該如何解釋自己的性別「弱勢」？他的辛苦如果只講性別受歧視，而不談階級，不談勞動條件日益限縮，又怎麼可能講得清楚呢？

另外，馬偕案也反映出「平權運動」的問題。大家重視周員的性別受歧視，但是卻對他勞工弱勢的位置無感，這讓我想到前陣子一位男明星祖雄說：「絕大部份同性戀與異性戀一樣，都只是希望與一個人手牽手一輩子在一起，這樣簡單的幸福！把同性戀跟荒淫無度、愛亂搞連結在一起是刻意抹黑，只會加深大眾對同志的誤解」。

祖雄說的這番話現在大概會被批評切割性污名，但是婚姻平權的推動完全就是用這種邏輯在招喚大眾支持的。要不然原本是多元成家三法案，為什麼逐漸切割掉大眾不容易接受的部分，只談跟異性戀一樣的同志婚姻呢？同運爭取平權往往都是踩在其他議題上推展的：「我們跨性別也是努力工作的好員工，職場上應該要獲得平等對待」，這句話一出來，立刻就把馬偕案周員所面對的勞動處境給踩下去，墊高了性別的重要性。

我另外一位女跨男的朋友—D 先生，憂鬱和失眠從大學持續到現在將近 35 歲了，學習能力比一般人低，睡眠又很依賴藥物，工作受挫，一年換數個工作已經是常態。他常說對政治有嚮往，會去幫國民黨候選人助選，尚想當國民黨青工會會長，臉書上有一堆政商名流的合照和臉友。我以前總覺得他是想要一種看起來體面的位置，但後來才知道他申請殘障補助（中度憂鬱）和低收補助，都會請民代幫忙喬到最高額度，做變性手術也有政治人物會贊助他（或幫他搞急難救助金等等）。原來政治狂熱只是我片面的認知，一切竟然都跟他的生存息息相關。

政治狂熱也是一種精神疾病，但一旦我們將他貼上標籤，我們其實看不到他真正的生活。D 先生說他因為學習慢、效率差而無法靠工作表現贏得友誼和敬重。有幾個善意的同事想協助他找出工作困難的原因，D 先生支吾其詞地告訴對方他變性的過去，設法藉著性別友善的氣氛為自己盤一些被體諒的空間，即便後來還是免不了被炒魷魚的命運，很快失效。租房子也是，他說不想租那種沒有公共空間的小套房，想分租有客廳有廚房的公寓，因為自己太孤單，希望生活上有朋友作伴，30 歲以前室友年紀都比他大，被問起在哪高就時，他可以隨便掰自己正在準備國家考試就把作息不定的生活交待過去，然而 30 歲之後，他的室友年紀都比他小，真的就是研究生，他很怕人問起他的工作狀況，不想做保全是因為不希望那些高材生的室友看不起他（曾經有人跟他說：保全是退休的人在打發時間做的，年輕人做這個沒前途），他更焦慮隨著年紀越來越大，他該如何交朋友又同時能夠交代自己的人生故事？於是他又跟室友出櫃他變性的事，讓自己不至於被魯蛇的自卑給淹沒。他在經濟不寬裕的時候買一台二手車，載朋友出遊，去 costco 購物，跟認識的大陸朋友說來台灣吃住都算他的，為了跟朋友維持互惠的關係（不想只拿別人的好處），結果給了一些超過自己能負擔的承諾搞得自己更焦慮，我曾經無法理解為何他要這麼「不自量力、愛面子」，後來總算看懂：比起性別，貧窮的壓迫更大。

然而，D 先生還是想要存錢做陰莖重建手術。他回去找小時候虐待他的母親，探究自己為何會嚴重失眠；去報名理工科夜校課程，彌補他小時候因為成績低落而放棄理工科的心願（他期待自己是那種有專業技能、有學識、有一群好哥們的理工科男生），當然沒多久就放棄了；他去美國投靠親戚希望能闖出一片天（沒多久就跟親戚鬧翻回台）；總之，他做了很多旁人無法理解的決定，原因無他，都是為了找到治癒嚴重失眠，脫離領補助的生活，以便進入人生常軌的方法。

以前跨性別社群內總有人說「變性人只想融入社會成為一般人」，但是我們卻發現「隱藏」是有條件的人使用的生存策略。受到經濟、階級壓迫的底邊人不要說外貌了，整個生涯都不可能融入主流假裝跟大家都一樣，出櫃反而有一線生機。

人身上的不平等是多重的，同志運動卻只聚焦在性別和性傾向上一直往前衝，把人身上的其他的議題都切割出去，這種劃分運動領域的做法在分析和行動上很便利，但是卻很容易扭曲事情的全貌。

最後，我想說一個自己的小故事，也許可以讓大家看得更清楚。

我第二任女友跟我交往半年之後寫了一封分手信給我，她說她想要過一般人的生活，結婚生子，不想再繼續跟我這種人交往。大家可以想見我收到這樣的分手信有多痛苦（她是知道我的跨性身份才跟我交往的，最後又用這種理由跟我分手！），我的情路坎坷，一路走來的挫敗都是因為性別的緣故，我多麼希望像一般人一樣正常可以結婚生子成家立業，所以同婚運動對於像我這樣想進入主流人生常軌的性少數來說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不過，我現在要把這個故事說得更完整一些，我的第二任女友是醫學系的學姊，在我大三升大四的暑假開始交往，她問過我要不要考學士後醫學系，希望我將來能夠有好的社經地位，這樣她比較容易說服家人和身邊的親友和教會接受我。我早年也被成就所困，像我這樣不男不女的人人生價值何在？心想，如果沒有一番上得了檯面的事業和成就，可能這輩子都脫離不了被質疑羞辱的命運，所以大學重考了兩次，都沒有上我想要的「有前途的」科系，於是接受學姊的建議，我去報名了「學士後醫學系」的補習班，但是上了幾個月之後覺得跟不上進度，想放棄。就在決定放棄考後醫，去補習班退費之後一週，就收到學姊的分手信……這才是比較完整的故事。

現在回想起來，學姊用性別的理由跟我分手，或許是對雙方都仁慈的說法，想進入婚姻，也意味著需要滿足很多幸福婚姻的條件，有房有車有事業加上經濟無虞，這些可能比有一個正確的性別還重要。我想說的是，一個人身上的性／別苦難是複雜的，性別至上卻又窄化意義的同婚和平權運動所撐出來的正義大傘，很容易遮蔽掉其他更使人難堪痛苦的結構性因素。講完了，謝謝大家。

黃道明（主持）：謝謝旭寬精彩的回應，非常發人省思，是個需要時間消化一下的故事，才能更理解旭寬表達的複雜性別苦難。我們現在開放討論。

賴麗芳：我想分析同志運動的對立現象是怎麼來的。我覺得一直以來，運動的修辭都是在「愛都是一樣的，沒有什麼差別」上面去主張，在其他議題上沒有任何耕耘。當你在愛上面做主張的時候，同志婚姻對支持同志運動的人是可行的，因為兩個人相愛就結婚，你們兩個人的性在婚姻裡面維持得好，不要流出到外面影響到別人，這樣的 LGBT 友善就是可行的。可是這樣的主張又跟宗教右派主張

的家庭的健全沒有衝突，你的性跟情愛都是在婚姻裡面得到維持，維護健全家庭的茁壯成長。兩者看起來對立但主張是疊合的。我覺得這個造成的擠壓就會回到我之前看到的宗教右派在講跨性別廁所的問題，新聞也一直被護家盟轉貼，它在散播一種「害怕被跨性人士在廁所性侵」的恐慌。我認為同志運動操作的愛的修辭，一直沒有正確的解決到跨性別運動裡面的那種對跨性人士的恐慌，因為你一直在講那個愛的修辭，事實上沒有辦法回應宗教人士的性侵恐慌，他就是把你當成危害社會、混亂根源的恐怖份子，這是一個。

另外就是，現在台灣兒少保護主義非常盛行，青少年的身體跟性被管制得非常緊，他們比較缺乏的就不是結婚的問題，而是要有情慾的空間。如果你講結婚的議題，實際上只會限縮住他們的空間，婚前性行為的禁忌只會更加強烈。他要如何在同志婚姻的主張之下長出情慾空間？如果他的家庭本來就是破碎的呢？在這個狀況下，他就更加被歧視，被認為問題就來自於你的問題家庭。很多人會逃家，逃家的人在同婚運動裡面也得不到支持，逃家的問題有很多都要回到住屋問題，你把一個青少年綁在他的原生家庭裡，他只能掛在那邊生存，其他社會資源都沒有。如果社會上能主張某種運動，讓這些人可以暫時性地逃家，他有困難可以在這裡居住，且居住權是不需要房租的。現在在外面租房子都是需要你有穩定工作，才能租房子，可是對青少年來說，逃家的人可能沒有穩定工作，如何思考沒有穩定工作人的居住權，在運動裡面完全沒有這種討論，這是我的回應，謝謝！

另外補充，其實在住宅問題上，兩邊可以有一些對話。例如現在宗教團體長期一直都在做逃家少年的安置與中途之家，他們其實也會關注到某些有問題的學生，教會可以提供什麼資源安置他們，這是他們的思考。可是我覺得對很多青少年來說，例如以我自己來說，如果我青少年時期援交被抓到，我不希望被安置到那個機構，因為對教會健全家庭的信仰沒有任何認同。那些機構就是以矯正你回到正途為主，你不想被矯正的話，其實就沒有地方可以去了。

Kenyon (何春蕤翻譯)：在美國，住屋問題對 LGBT 年輕人來講是個非常大的問題，因為無家可歸的青少年當中有 40% 是認同為酷兒或是跨性別的。跟台灣很相似的是，這些安置空間基本上都是被宗教團體經營的，這一類空間進行的管理跟監控也就可想而知。還有，美國的研究數據顯示，對 LGBT 年輕人而言，不穩定的居住狀況跟 HIV 感染息息相關，是造成 HIV 感染最重要的因素。主流的平權運動真正開始談住屋，是因為要談他們結婚以後住哪，好像住屋只跟結婚以後的生活狀態相關，因此談得很膚淺，而比較沒有去談逃家 LGBT 年輕人的需求。過去多年來，都是由酷兒或是比較關注經濟正義的團體、關注 HIV 的團體在討論青少年或者 HIV 帶原者的住屋問題。我同意你的說法，LGBT 年輕人常常因為家根本住不下去而離家出走，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真的需要有住處，我認為這是非常急切的需求。

賴麗芳：那你們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Kenyon (何春蕤翻譯)：對一個沒有太多資產、資金的 NGO 而言，要如何推動青少年住屋議題？我們現在是沒有任何正式的資產、資金可以協助，那就只能創造人際網絡，看看有沒有善心人士能讓年輕人暫住。這種暫住也有可能產生問題，在台灣特別容易出問題的就是被當成法律上的「容留」。你把一個未成年的人收容在陌生的居住地，萬一在關係上出問題，會不會有其他麻煩？例如發生性

關係，就變成了法律事件。如果要收容未成年居住者，往往會有一些很微妙的狀況，就是一方面法律上有很多限制，有可能會惹來麻煩，所以在收容的時候需要謹慎。另一方面，我住在華盛頓的時候遇到一位逃家的青少年，是同志且 HIV 陽性，他逃家之後就告訴收容他的人，說媽媽不喜歡他是同志，也無法忍受他是 HIV 陽性，因此他被趕出家門。結果 NGO 收容他之後，他媽媽隔了一段時日後出現，說：「他是同志，我很 OK，我也知道他是 HIV 陽性。我之所以對他不滿，是因為他不肯上學！」所以，有時跟青少年溝通，青少年離家的理由有百百種，說出來的理由不見得是真正的理由。有時候也不見得是家裡活不下去，而就是不喜歡家裡，不喜歡被管，喜歡有自己的空間。這種狀況就很微妙。因此青少年的收容問題，不是找個空間就那麼簡單地解決，跟他周圍人的溝通本身都有複雜的狀況，一方面你希望支持他們的自主性和自決力，但是你也需要注意他們離家的願望是真的想離開家，還是因為父母容不下他們。

靜如：我是為移工服務的。我想問的是，其實 Kenyon 剛剛分析的狀況，還有包括旭寬分享的那些狀況，同志以外的 LGBT 群體面對的，婚姻先不說，實際工作狀況怎麼做？這是我想要知道的。譬如說我想要知道，不走主流同志論述那一套的，如何跟工會團體或移工團體去討論這些在性別上的非主流？非主流同運要的這些東西，要如何得到工會、或是移工團體的支持？在台灣的限制是，工運團體，不要說討論同志，連討論性別都很少，除了同工同酬一直喊，到現在一直沒有完成任何之外，要怎麼去談同志？怎麼讓他們理解同志運動其實有非主流同志這塊？我想知道 Kenyon 在他的工作經驗上有沒有類似的經驗？

Kenyon (何春蕤翻譯)：在美國，主流 LGBT 團體和工會的關係其實是很詭異的。一方面有些工會內部已經有 LGBT 工作小組，他們會特別關注 LGBT 工人在某些特定工作情境中的狀態。但另一方面，LGBT 運動對工人議題的認知也非常表面，像每年美國最大的就是人權議題，也是美國經費最充裕、捐款最多的一個運動。每年人權運動就會提出文件，表列出當年對 LGBT 最友善的企業排行，或是對同志最友善政策的公司，但是看了這些表列出來的企業，你會發現都是那些在人權議題上劣跡斑斑的跨國企業。也就是說這些跨國企業之所以在人權紀錄上得分高，只是因為他有一些 LGBT 的相關政策，譬如說廁所、育嬰、員工福利。在這些方面你就看得出來，違反人權跟同志友善出現了微妙的矛盾狀態，而這一類的紀錄也往往會被美國宣傳作為美國進步的指標之一。剛才靜如所問的問題，如果此刻台灣的工會都還沒有開始想性別的問題或是性傾向的問題，當然會是一個很困難、充滿障礙的路途。在美國，工會內部本身的同志先出來，把他們的議題在工會裡面提出，經過了很長時間的工作，才使的工會裡面開始有了一些 LGBT 意識。這是一個長期工作的結果，但是此刻開始的話，可能只能從提醒工會認識到不同主體的存在和在不同勞動條件下的需求，當然也可能在雙方接觸之下發現可能對方不是最好的同伴，也就是說，話講不通，那這個只好繼續努力。

靜如：我是想問，剛剛提到很多跨性或 LGBT 的人，其實會很確實碰到勞雇問題、聘僱問題。那 Kenyon 他們會怎麼樣處理這個議題？譬如說，一開始是做自己的團體，但是怎麼去做連結？我想問他實際的經驗上有嘗試過這樣做嗎？怎麼做？

Kenyon (何春蕤翻譯)：先講如何在工會裡面搞組織。一般來講，勞動現場的 LGBT 要設法進入工會，因為這樣才可以有發言權，並且因為你的加入，慢慢帶

入其他人，形成一個小的組織。這個做法不是很正式大張旗鼓的做法，而是先從跟人聊天開始，跟人談相關的問題。比方說如果在一個勞動現場，你認識一個女同志，那她通常還會認識別的人，人際關係的線就可以拉得起來。等線拉起來之後，就可以去談現在這個勞動現場有什麼議題。跟勞動相關、跟性別相關，跟什麼議題相關都可以，透過討論各式各樣的議題去建立人際關係。然後在你自己的勞動現場找人串起來。有時候有可能政府丟下什麼政策，或是外面有什麼行動，透過政策和行動的參與，就可以拉到一些人。

有些人參加活動時每次想到要拉的都只是那幾個人，可是我不相信就只有那幾個人，上檯面的也只有那幾個人。我們總是會去找新的人，不一樣的人，去挑真正在做事情的人。我總是問：「要不要找某某來？」關係是要這樣才能建立起來的。所以有些人常常取笑我，你什麼人都認得！人脈那麼廣！其實我刻意希望可以認得所有人，知道全國哪些地方有哪些人可以做什麼樣的事情，然後把連線拉起來。最主要當然要找實際可以做事情的人，把這些人記著，創造機會場合讓他們連結在一起，有那個機會才有可能談議題，議題談得出來，才能改變老舊的建制，新的提議才可以變成新的議題。

如果確實遇到跨性別、酷兒主體遭受到工運上的歧視，先決條件是他們願意出頭、願意面對大眾說出他們的狀態。也許有很多人不願意出櫃、害怕報復，如果這些人願意出頭，才能把這個議題講得出來，形成議題。作為組織者，在工會裡應該有人，你可能會跟對方接頭談，要工會出頭去處理這件事情。當然工會會不會出頭是個問題，下面就變成兩條路線，第一條，總是要問，我媽常說，問了總會有一個答案，不管是或否，問了四、五次以後，說不定人家就會肯做了，所以要多問幾次。第一招就是跟對方好好說，問工會願不願意處理這個問題，如果工會老是推推托托吃案的話，那你可能就要對付工會，也就是說要對工會施壓，要求工會回應工人遭遇到的狀態，要求工會提出具體的策略幫助個別的人。

當然你也會遇到像旭寬講的馬偕事件裡面的複雜狀態。也許他面對到的真正困難不是來自於性別或性傾向，而是來自於一些生活上其他的弱勢情況，那當然有它的複雜性。旭寬都講了這麼多次才把它講清楚了，我相信我們也還沒有想清楚遇到這種事情要怎麼處理。只能說青少年住屋議題一樣，摸著石頭過河，一步一步注意小心各種微妙的情勢。

靜如：其實我比較想問的是實際問題。在 Kenyon 的脈絡裡都是在講非白人、弱勢的，我假設他常常會碰到勞工階級，甚至有移民勞工，那麼這些事情跟工會、主流工運有相關嗎？我其實想理解在美國是怎麼樣？這一支非主流 LGBT 運動和工運有任何互動嗎？或者現在還沒有任何互動？

Kenyon (何春蕤翻譯)：美國的狀況其實有一點在變化中。過去幾十年，年輕人跟工會的關係一直都蠻薄的，因為在美國雖然有很多工會，但大部分的大型工會基本上只管會員。誰是工會會員，我就為誰著想，是一種服務型的組織，其實沒有去組織勞動者大眾。我們也看到這些大型工會越來越弱，因為他們其實沒有在作勞動組織工作，只做服務型或在集體討價還價時出場。另外，因為很多各式各樣歷史原因，有些地方沒有工會，有些行業沒有工會，可是在過去幾年我們看到了一些變化，就是看到有一些，有時是工會主動，有時候是其他一些組織發動的行動，這些行動開始去組織沒有工會歸屬的勞動者，幫助他們跟雇主做集體談判。

例如紐約零售業。當時他們發動了一個行動叫「紐約零售行動計畫」，這個行動計畫本身不是一個工會，但它組織的是本來就沒有工會的零售業勞動者。大家都熟悉像是賣時裝的優衣庫、H&M、Zara 等等，這種店工作人員本身就是酷兒、跨性人口比較多的，所以他們在組織上就會有一些很特殊的議題在這個空間裡面出現。當時他們也去跟我所服務的「酷兒經濟正義組織」聯繫，希望在談到勞動跟雇傭關係的時候能夠特別關照到跨性別和酷兒勞動者的需求。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得出來，目前這種新的組織串連方式，有的時候是在工會之外進行勞動者的動員，有的時候是跟某些工會跟某些事情串在一起。最近在像沃爾瑪大賣場或是麥當勞速食店的抗爭議題上，都是一些無工會的工人組織起來進行訴求。所以，是不是一定要跟工會有密切的關聯，也是看狀況、看條件。

王咪咪：想知道你們是怎麼賺錢，獲得那個資金的？很實際的問題。我想說的是，在台灣這幾年，很多資源都流往做同志婚姻運動的組織，台灣主要去推那個法律運動的組織在這兩三年資本額多了一倍，然後馬上就跟台灣最大的同志運動組織「熱線」變成同樣的資本額，兩三年的時間就直接翻了一倍。之前我去了一個多元成家友善論壇，在信義區誠品，就是台北地段最貴的地方，大概一個小時租金要 8000 塊。相比之下，過去〈破報〉跟〈立報〉曾經是酷兒和同志運動的發展場域，現在死了，另外一個死的還有清大月涵堂，月涵堂可能是我們這些人都會去辦活動的場子，租金很便宜，可是 2014 年清華把它變賣出去，也是在這樣整個私有化、民營化的脈絡下，很多酷兒的討論、存在、立身的空間一個一個的消失。權促會好像也瀕臨破產。所以我想問，組織是怎麼幫自己搞到錢以便有辦法繼續做事情？

Kenyon (何春蕤翻譯)：唉！大哉問！我們到底要怎麼樣持續激進的工作呢？其實我們面對的也不只是台灣或美國的困局，而是全球的形勢。在婚姻平權方面，資金很多，可以來自民間企業機構，也可以來自於美國政府，所有這種對於單一議題推動的組織或運動，往往比較容易得到補助。想要串聯起不同議題，把激進部分挖掘出來，越來越難，因此你看到很多激進組織越來越難以生存，有很多都垮了。他們做的工作雖然很重要可是很難推動，而他們周圍的議題也正在轉變，我想這個問題是沒有辦法提出回答的，我們在場也沒有人能夠回答這個簡單的問題，就是：我們到底能做什麼？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就是，資本一直在跨越國境，全球橫行，我們看到很多大型的國際組織，G 20、WHA、WHO 這些組織都在重新定義疆界、國界，重新組織起來拆解障礙，讓資本更容易運行在全球。遇到這樣的一個大變化，我們應該做些什麼？

我不知道答案，所有這些我們認識的社會理論家都想給答案，也都還沒看到什麼好答案。所以面對這樣大的困難，特別問到很具體的問題，自己所屬的單位、組織要如何找到資金，其實很困難。以過去「酷兒經濟正義組織」的經費來源而言，很多時候不是來自於大型 LGBT 基金會，而是來自於其他的運動組織，也就是說很多時候我們雖然做的工作串聯很多不同領域、不同軸線，可是 LGBT 團體沒有辦法看到這種複雜的視野，反而是另外一些激進運動組織可以給我們組織一些幫助。如何籌募資金，我沒有答案，如果有答案，我就募資金去了，我也會立刻教大家如何募資金解決問題。所以，還是那句話，摸著石頭過河，自己繼續想辦法。有錢做有錢的事，沒錢做沒錢的事。

王顥中：Kenyon 講到美國的同志運動在全球擴散跟輸出的狀況，雖然因為時間的關係可能不太能再談太多，但是蠻想要再多聽一點這個部分。實際的狀況一定更複雜，因為保守派往往也會說，我們本地是沒有同性戀的！從 1990 年代就聽到這樣說，我們根本沒有同性戀，都是西方的東西，我們要考慮本地國情。所以面對這個現實，同志運動確實從西方先進國家輸入，影響在地的議程，在地的團體要考慮怎麼樣面對這個趨勢。考慮是很複雜的，因為包含在台灣，支持同性婚姻的團體也會自我辯駁，說他們有看到這個國際趨勢，但他們必須借力使力，包括中國大陸其實更明顯，關於國際資金怎麼進到中國大陸支持他們的團體，也影響了議程。在地團體可能是全然拒絕，也有可能是折衷，也有可能是說自己是借力使力，我覺得 Kenyon 講了南非的經驗，但還是想要多聽到一些其他的經驗。特別是 Kenyon 自己也是美國運動經驗的代表，美國同運成功，其實當中也有很多的挫敗經驗，比如說沒有看到種族。顯然美國內部也是有一些挫敗經驗的，那這些挫敗經驗就會跟輸出過程中在接受端的我們這些第三世界國家，被美國影響之後，本來的在地議程不見，本來的在地議程會跟 Kenyon 這種在美國內部挫敗的經驗接合在一起。那我想聽，今天講到南非，有沒有一些其他類似看過的、複雜的在地團體考量？

曾浚赫：我想問 Kenyon 在美國的脈絡當「失能」同志的這一塊。在美國，Americans with Disability Act 這個團體是第一個爭取失能者權利的運動，這個運動主要爭取的還是工作環境、public service、public accommodation 這些看起來比較有正當性的問題。我想問，Kenyon 過去有沒有處理過失能者同性戀的問題，我覺得在我看的這些資料裡面，他們都巧妙地避免談性，好像性是危險的，很容易變成標靶。

Kenyon (何春蕤翻譯)：先回應王顥中的問題。其實過去在美國，各式各樣的組織和運動彼此之間是有一些串連的，而他們自己也有自己原先因為所共同運作的議題，像跨性別者、移民、拉丁裔人口往往比較容易遭遇到警察暴力，所以在這個議題上這些組織本來就長年耕耘，他們也比較容易團結在一起對抗警察暴力。平權運動來了之後，當然火車一來衝垮了很多東西，但是這些本來就針對警方暴力發聲的團體還會繼續做他們原來做的事，他們所感受到的差別就是資金減少了，大家都去支持婚姻平權了。但是也因為他們長期的耕耘，因為他們來自於跨性別、或是來自拉丁裔、或是來自移民的團體，共同在警方暴力的議題上耕耘的時候其實彼此開始認識，因此也使得族裔團體有了性別跟性傾向的認識，而性別性傾向的意識也會看到種族的意識。因為他們在共同的議題上經營過。所以大概最重要的，就是你是否有自己的議題可以持續地耕耘吧！

有關失能的問題，當然在主流的失能運動裡面多半談的是福利跟服務，其他的像是在激進或是追求正義的運動裡面，組織裡面當然因為有很多 trans 跟酷兒，所以他們的運動裡面就也有很多激進議題進來。舉一個例子，1980 年代愛滋相關運動其實是跟失能連在一起的，因為當年運動所推動的就是讓 HIV 的相關診斷成為失能法案的一個部分。也就是說 HIV 跟失能在法案裡面同樣是被當成一個類型，因此這兩個議題也都在一起談，相關的激進的語言可以在這個運動中流通，很多對 HIV 的討論仍然被放在失能的框架裡談，而且有很多跨性別和同志是 HIV 陽性。另一個就是跟失能相關的酷兒或者失能或者正義運動，往往指出一個很重要的事實，那就是社會對於失能的想法往往使得那個被認定為失能的人必須要孤立地過生活，因為他沒有能力做這個做那個，他沒有能力去參與性的活

動，他沒有能力產生後代。這種讓個體孤立的趨勢是酷兒失能正義運動批判的對象，因此在這些運動影響之下，我們當然要求環境、社會福利可以提供給我們同樣的方便。可是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指出，我們活著的世界正在積極創造大量的失能人口，各式各樣環境惡化、食物污染、軍事戰爭都正在創造大量失能人口，與糖尿病相關的飲食習慣和口味也使許多人失能。對於這個世界這樣大量創造失能人口，然後再加以歧視、加以限制，這個是在酷兒失能正義運動中必須要加以批判的對象。

黃道明：今天的活動必須到這邊結束了，我想用一分鐘講一下我今天的感覺。**Kenyon** 的分析非常精彩，點出了我們酷兒抗爭的左翼歷史如何從左轉向右，等於是同婚運動的前史，同婚的價值又是如何透過美帝跟資本主義流轉到世界上，在各地造成控制。我覺得在旭寬講的裡面，大家聽到有一種感動跟震動，他回到人際關係裡面去看這些權力，也就是 **Kenyon** 批判的東西，權力架構裡面這些很細微的人際互動，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現在去搞酷兒運動跟性別運動需要去專注思考的。謝謝大家。

逐字稿人員—陳思瑀